

南开大学出版社

全金诗

第一册

薛瑞兆 郭明志 编纂

全金詩 (一)

薛瑞兆
郭明志
編纂

南開大學出版社

序

從白山黑水間崛起的金源王朝，在中華民族文化發展史上曾經有過不容忽視的建樹。當這個封建王朝剛剛被摧毀，易代的劫火尚未熄滅時，一代文宗元好問即發願搶救金源文獻：「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無聞。」（《大德碑本遺山先生墓銘》）可是，由於種種歷史的原因，連同元氏的呼喚都泯沒已久了。

一

金源，意為金水發源地。金水，指今黑龍江省境內的松花江支流阿什河，《金史》稱「按出虎水」。按出虎為女真語，意為金。以其地產金，故而名水。女真族即發祥於此，因建國號為「金」，定都於阿什河上游，是為上京會寧府，地當哈爾濱阿城市近郊的白城子，其城郭宮殿遺迹至今猶存。後世因以金源稱金朝。

女真人原是以游獵為生的民族，質樸粗獷、蠻勇好鬥。自肅慎、挹婁、勿吉、靺鞨等先世的不斷繁衍和開拓，至公元十二世紀開始崛起，以強悍英武的姿態先滅遼國，繼克北宋，建立起與南宋王朝劃江并峙的大金帝國。女真族立國前，其社會文化的發展極為緩慢，長久地處於原始的蒙昧狀態。但是，當金人的鐵騎踏破遼、宋都城的大門，盡情攫取那裏各種燦爛的文化元素，把兩國官藏府庫的典籍、儀仗、

鐘磬、禮器以及包括諸多文化、藝術、科技精英人才席卷一空時，他們也就走上了被中原華夏文化征服的路程，經歷百餘年而造就一代新的北方文化——金源文化。

事實上，女真族被中原文化同化的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大金統治者惟恐自己的傳統文化被遺忘，由此危及帝國的根基，曾經採取過一系列措施，如辦女真學校，設女真進士科，創譯經所，系統地把漢語經典文獻譯成女真文，企圖在保持傳統文化的同時吸取中原文化的精華，重振女真民族精神。問題在於，中原文化實在悠久、系統而先進，與女真社會射箭爲號、結繩記數的文化形態所形成的落差過于懸殊。中原文化的吸引力決非大金統治者的主觀意志能够抵禦的。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女真人被中原文化同化的過程是從大金社會的上層開始的。在諸猛安謀克移居關內各地後，紛紛改易姓名，從飲食、起居、節序、婚喪等風俗禮儀各方面，無不「強效華風」（宋范成大《攬轡錄》），例如，阿骨打即改稱「王」姓；金熙宗完顏亶自少時賦詩染翰，雅歌儒服，「盡失女真故態」（《大金國志·熙宗孝成皇帝》）；金世宗完顏雍一生倡導女真文化，而自己却朝服乘馬，「效宋真宗故事」（《金史·世紀補》）。這些最高統治者的實際行動，很容易抵消他們自己頒佈的政令可能起到的作用。因此，女真貴族在接受中原的生產方式，進而完成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過渡的同時，也就不可能不受到中原文化的強烈影響。甚至可以說，女真族正是憑借這種影響，才跨越了原來低級階段的社會形態，建立起一代封建王朝。即所謂「金用武得國，無以異于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金史·文藝上》）。

金文化形成的基礎是北方各民族間的融合，這種融合以漢民族爲中心，隨着中原文化的北移而深入。其中，一個重要標誌是語言。自金初，漢語是包括漢、女真、契丹、渤海、高麗等北方各族人民的通

用語。「凡聚會處，諸國人言語不通，則各以漢語爲證，方能辦之」（宋許亢宗《宣和奉使行程錄》）。後來，大金君主從維繫自身的尊嚴和統治出發，「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續資治通鑑》卷九三），創製了女真文字，並運用政令強制推行。由於創製日近，義理尚淺，在社會上無法取代漢字的地位。即使皇家子弟讀書，也是每日先教漢字，後習女真語，漢語文字逐漸成爲金朝的官方語言，以至不少女真人對自己的民族語言竟「或不通曉」（《金史·樂志》）了。另一個重要標誌是通婚。女真貴族在入主中原初期已與漢族通婚，但在社會下層是受限制的。後來，大金統治者出於緩和民族矛盾的需要，轉而鼓勵那些遷入內地的猛安謀克與契丹、漢人婚姻，以相固結（《金史·兵志》）。這在客觀上大大促進了北方各民族間在血緣上的接近，使女真人的民族特性漸次消失，與漢族及其他民族間的差異日益縮小。當然各民族間的文化影響是相互的。女真人的一些適應北方環境的生活方式和習俗，如便於騎射和勞動的服裝，及飲豆漿、吃葱韭、燒火炕等等，也爲中原漢人所接受。女真人的語言、文學、音樂、舞蹈，也都給予漢民族以影響。這樣，北方各族人民在長期共同的社會生活中，語言障礙消失了，生活習俗接近了，甚至在民族心理方面也趨於一致。因此，自蒙古統一中國後，即把女真、契丹劃入北方漢人的範疇。

金文化仍以儒家思想爲核心。自大批遼宋士人歸附金朝後，他們也把儒學文化帶入了女真社會。熙宗時，上京始建孔廟，並封孔子後裔爲衍聖公，詔令天下縣鄉效法，稱「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金史·熙宗紀》），從而確認儒家學說爲大金君主臣民所崇信的精神原則。實際情況是，女真貴族在推進封建化的過程中，急需從意識形態方面鞏固政權。特別是金世宗鑒於金熙宗與海陵王接連被臣下所殺，因而有目的地把儒家的忠孝觀念作爲調整君臣、宗族和家庭關係的準則加以強調。爲此，曾多次詔

令頒佈《孝經》，譯《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金世宗嘗言：「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真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金史·選舉志》）。這樣，經過大金統治者的不斷提倡，儒家學說終於成爲女真人的文化思想和民族心理的基礎。當初「妻母報嫂」的婚俗至金末已漸泯除，「丁憂廬墓」之制則爲越來越多的女真人所奉行。

同時，由於北方較少程朱理學的影響，金朝又注重應用於實際的經學，結果有效地發展了吏治。這對於迅速恢復和開發北中國的經濟起到了積極作用，也使金源文化更具特色。雖然金文化未如宋文化廣博精深，而在純樸實用方面則爲宋所不及，即所謂「宋自南渡後，議論多而事功少，道學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獻實並入金」（《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其顯著的特點是：無論女真人、契丹人、渤海人或是漢人，都以華夏文明爲正宗，努力把中原文化發展爲北方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北方少數民族出身的學者和作家第一次在中華民族文化史冊上佔據重要地位，爲金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傑出貢獻。而其歷史的結局是由多民族文化的融合，逐步形成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文化。然而，「世多以金偏安一隅，又國祚稍促，遂謂其文不及宋元。不知有元一代文章皆自金源啓之。無論遺山老人才力沈雄，超出南宋諸公之上，即如趙閑閑、王漳南等，視虞（集）、范（梈）輩何多讓焉」（清潭宗浚《金文最序》）。與江南相比，北方風氣粗獷，人之氣質渾厚，發爲文章，類皆華實相扶，骨力遒勁，一掃柔弱浮靡之風。正如時人所说：「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元好問《論詩絕句》之七）

二

金詩作爲金源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思想內涵或是藝術風貌都屬於中原文化的範疇。

女真人也曾經有過自己民族形式的詩，如巫歌、詛咒歌、自度曲以及謠諺等等。有些作品因當時被譯成漢語而得以保存下來。研究結果表明，其顯著特點是句頭押韻，通俗流暢。然而，自女真貴族入主中原後，諸猛安謀克競相棄武從文，掀起了學習中原文化的熱潮，很快即為漢詩的完善格律、優美韻調所吸引，隨之放棄了原有質樸粗獷的形式。而那些民間文學只能在女真下層社會流傳。

這些情況到金世宗時有所改變。世宗竭畢生精力倡導女真文化，為重振民族精神做出傑出貢獻，女真民族文學也得以復蘇，並發展為貴族所唱的「本曲」。大定二十五年，世宗親率女真諸王回上京體驗傳統生活，在皇武殿宴宗室弟子及群臣故老。《金史·世宗紀》把這次活動當作一件大事記載下來：

上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為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聽上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聲，歌畢泣下。

幸好，這支「本曲」保存在《金史·樂志》中，題名為《本朝樂曲》：

猗歟我祖，聖矣武元，誕膺明命，功光于天。拯溺救焚，深根固蒂。克開我後，傳福萬世。無何海陵，淫昏多罪。反易天道，荼毒海內。自昔肇基，至於繼體。積累之業，淪胥且墜。望戴所歸，不謀同意。宗廟至重，人心難拒。勉副樂推，肆予嗣緒。二十四年，兢業萬幾。億兆庶姓，懷保安綏。國家閑暇，廓然無事。乃眷上都，興帝之第。屬茲來游，惻然予思。風物減耗，殆非昔時。於鄉於里，皆非初始。雖非初始，朕自樂此。雖非昔時，朕無異視。瞻總慨想，祖宗舊宇。屬屬音容，宛然如睹。童孺孺慕，歷歷其處。壯歲經行，恍然如故。舊年從遊，依稀如昨，歡誠契闊，旦暮之若。於嗟闊別兮，云胡不樂。

的譯本，而徒具女真文的外殼。

女真貴族學習中原文化的結果之一是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爲當時寫作漢詩的高手。

第一個代表人物是海陵王完顏亮。其在藩邸時，嘗有題扇詩曰：「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胸中大志勃然而出，氣度不凡，一片天籟。登帝位後所作《南征維揚望江左》云：「萬里車書盡會同，江南豈有別疆封。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宋岳珂《桯史》卷八）骨力遒勁，自然明快，反映出女真人在創業階段豪爽英邁的心態，也說明女真貴族在吸取中原文化營養的同時，仍保持着北方少數民族的天然本色。

第二個代表人物是金章宗完顏璟。即位前，他的女真語成績在諸王中是最好的，入朝嘗以女真語謝恩而受到過金世宗的嘉獎。即位後，在倡導女真文化方面却没有做出甚麼建樹。他的漢詩寫得很好，典雅精工，瑰麗纖巧。如《宮中絕句》：「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卷，東風無處不揚花。」再如《夜飲》：「夜飲何所樂，所樂無喧嘩。三杯淡醅醪，一曲冷琵琶。坐久香成穗，夜深燈欲花。陶陶復陶陶，醉鄉豈有涯。」金章宗也擅長填詞，與海陵王相比，又別是一家。如《蝶戀花·聚骨扇》：「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縷小細花草門，翠縑更結同心綬。金殿日長承宴久，招來暫喜清風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再如《軟金杯·擘橙》：「風流紫府郎，痛飲烏紗岸。柔軟九回腸，冷卻玻璃盞。纖纖白玉葱，分破黃金彈。借得洞庭春，飛上桃花面。」（金劉祁《歸潛志》卷一）

這些詩詞雕琢細膩，頗似南唐李後主風韻，顯示出女真人在接受中原文化過程中漸次擺脫原有質樸粗獷性格的傾向。而描寫的具體形象反映了金朝社會承平日久，封建深化的宮廷侈靡生活風貌，與

趙宋帝王已別無二致。

第三個代表人物是密國公完顏璘，章宗之弟，卒於金亡前二年，當時被譽為「有俊才」。他是女真貴族最後的著名詩人，不幸生逢國祚危亡之際，王朝的命運與個人的遭遇都落在痛苦的境地而無力掙扎。反映在詩篇裏，則是情調低沉，麻木淡然，既不表現抗爭，也較少哀怨。例如《絕句》：「孟津休道濁于涇，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幾時桑柘底，只談王道不談兵。」於是，他把自己的視角更多地轉向大自然。《北郊散步》云：「陂水荷凋晚，茅檐燕去涼。遠林明落景，平麓淡秋光。群牧歸村巷，孤禽立野航。自諳閑散樂，園圖意猶長。」作品展現的情景宛如一幅疏落有緻的水墨畫，文華落盡，瀟灑淡遠，深得唐人山水田園詩真諦。這位女真貴族完全涵泳於中原文化的精神之中了。他甚至在《自題寫真》中還以攀附宋宗室詩人為榮：「枯木寒灰久亦神，應緣來現胙公身。只因酷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金元好問《中州集》卷五）

恰好，這三位女真貴族詩人分別代表了大金帝國從創業、守成到衰亡的不同歷史時期的詩風，透露出女真人在詩歌創作上接受中原文化影響的軌迹。這種影響浸潤到民族心理結構的審美層次，不僅是表層藝術形式的同一，而且在深層的思想內涵方面也很少表現出差異。可以說，這種影響使女真人的民族個性趨向泯滅。

金詩的發展可略分為四個時期。

從金太祖收國元年到海陵王正隆末為金詩發展的第一時期。由于女真貴族剛剛滅遼克宋，戰爭頻仍，無暇偃武修文，包括詩歌在內的文學創作尚處於準備階段。這一時期的代表詩人有宇文虛中、蔡松年、張斛、高士談、吳激以及完顏亮等，多是趙宋文人，後世稱之為「借才異代」（清莊仲方《金文雅》。

序》。這些人由於國事家境及個人榮辱遭遇等不同因素的影響，使詩的內容呈現出千差萬別，但大都崇尚蘇軾黃庭堅倡導的文風，在藝術上追求樸實明快的審美效果，即所謂「金源文物纂遼宋，國初尚有宣政風」（元郝經《讀党承旨集》）。他們爲中原文化在北方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推進了漢人與女真人及其他北方少數民族在文化上的融合，使金詩從開始就能站在較高的起點上向前發展。

從金世宗大定初到金章宗泰和末是金詩發展的第二時期。在此期間，大金帝國與南宋王朝以江淮爲界，各自偏安，遭受破壞的北方經濟因此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出現了「文治既治，教育亦至，名士之舊與鄉里之彦，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祿益輕，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的局面（元好問《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從而爲文化的繁榮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當時詩壇日益興盛，人才濟濟，名家輩出。代表人物有蔡珪、党懷英、王寂、周昂、趙風、王庭筠等，大都是宋人的後裔。如果說這些人的前輩難以擺脫原有的民族意識，在作品裏或多或少地流露出無奈仕金的哀怨，滯留北方的牢騷以及對故國家園的懷念，那麼，他們這一輩早已成爲金國的忠實臣民，在感情上已與金源王朝融爲一體。因此，這一時期的詩人在繼承前輩詩歌創作成果的基礎上也吸收了北方少數民族文化的營養，逐漸形成自己的特色，即所謂正傳之宗的「國朝文派」（《中州集》蔡珪小傳）。同時，由於朝野無事，侈靡成風，詩歌創作也出現了多華少實、徒事藻繪的不良傾向。

從衛紹王大安初到金哀宗天興末年，是金詩發展的第三時期。貞祐二年，金國遭到空前劫難，女真貴族在蒙古軍隊的壓迫下南遷汴京，尖銳激烈的民族矛盾成爲文風轉變的契機。正如時人所說：「南渡後文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倡之。」（金劉祁《歸潛志》卷八）在此期間，大金國勢日益衰微，而詩歌創作却異常活躍，文學批評和理論思辨能力達到了新的高度，不事雕琢、重

在達意的文藝思想佔據了主導地位，從而促成審美傾向的轉變，一掃虛飾浮艷之習，扭轉了詩壇瀰漫一時的多華而少實的風氣，產生出一批關心社會民生的現實主義作品。代表人物有趙秉文、楊雲翼、李純甫、王若虛、完顏璘等。

從金國滅亡到元好問逝世是金詩發展的第四時期。在此期間，女真貴族統治結束了，而詩壇却發出嘹亮的遺響。金元易代之際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其時，金國雖已滅亡，中國南北方仍處於動亂之中，蒙古人正忙於為統一而進行戰爭，治理國家的機制幾乎完全襲用大金帝國原有的形式。這一時期的詩人都是在金朝文化教育下成長起來的，許多人曾登科第為命官，金亡後，或高蹈遠居、悠遊山林，或依附新貴而為幕僚、參議。他們從不同方面寫下了大量反映社會動亂的詩篇。如河汾諸老，是隱居在山西河汾地區的詩人群體。這些人的作品歷來被認為屬於金詩。與河汾諸老大約同期的另一個詩人群體是東平文士。山東東平地區在金亡前即已歸附蒙古，但在原為金人的嚴實父子的治理下，實施開明政治，「四方之士，聞風而至」（《元史》卷一五九），聚集一大批金朝流亡文人，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的文化經濟建設，使東平保持了二十多年的穩定和繁榮。東平文士的詩歌創作更多地體現了金代文學的特點，實際是金詩的延續，亦應視作金詩的組成部分。

這一時期最為傑出的代表人物是元好問。元氏生長雲朔，為拓跋魏氏諸孫，其天稟多豪健英傑之氣。由于親身經歷了國破家亡的慘痛遭遇而寫下大量傷時愍亂的篇章，用情既深，內涵愈豐，加之才力富健，精思銳筆，其廉悍沉摯之處尤為突出，使金源詩歌放出奪目的光輝。正如後人所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清趙翼《題遺山詩》）

這一時期比較著名的詩人還有李俊民、楊宏道、劉祁、杜仁傑、麻革、段氏兄弟、陳氏兄弟等等。這

些人面對金元易代之際干戈紛擾的社會現實，或逍遙雲林，留下了不少遊樂山水、賞心田園的作品，以排遣無可奈何的苦悶心緒，或痛定思痛，潛心思考女真貴族覆亡的教訓以及金詩的得失。值得一提的是，劉祁在繼承緣情而發的詩歌創作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詩的審美思想：「唐以前之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間俚曲也。」（《歸潛志》卷一三）詩人以少見的理論勇氣超越了封建士大夫的偏狹，揭示了俗間俚曲以其見喜怒哀樂之真情，故能蕩人血氣，具有強烈的審美感染力，代表了文藝發展的方向，從而預示了北曲雜劇繁榮時代的新篇章。

三

對金詩進行較全面的搜輯整理，編纂一代詩歌總集，始於元好問。元氏以擔荷歷史重任的使命感 and 責任感，在汴京陷落後不久，就開始進行這項宏大工程。他在序中寫道：「亦念百餘年以來，詩人爲多，苦心之士，積日力之久，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亡，計所存者，纔什一耳。不總萃之，則將遂湮滅而無聞，爲可惜也。」歷經十五載，終於編成《中州集》。全書十卷，收詩家 257 人，詩作 2060 首。在每一詩家名下，各繫小傳，或記其仕宦出處，或記其交遊軼聞，或評論詩格高下，傳述名篇佳句。或附論他人他事，成爲傳中之傳，起到了因詩存人，以詩存史的作用，爲一代詩歌清本正源，確立了中州詩派在歷史上的地位，爲保存金源一代文獻，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但是，由於《中州集》不收時人作品，致使金末許多重要詩人詩作，包括元氏自己的作品，都未能收入此集。以總集視之，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越元明兩代，這一缺憾未能獲得補救。至清代漸有學者致力於此。清初揚州人郭元釁對金詩進行

搜集整理，在《中州集》的基礎上增補元好問、劉祁等人的詩作，編就《全金詩》稿本，進呈康熙皇帝。帝「遂命更加搜輯，凡金人集之斷簡殘篇有可存者，綴摭薈叢，巨細不遺」（《聖祖仁皇帝御製全金詩序》）。郭氏稿本已失傳，我們今天看到的是題為「郭元鈺原編、康熙五十年敕編」的《御定全金詩增補中州集》七十四卷本。比之《中州集》，「所增補者卷六倍之，人幾三倍之，詩倍之」。這在一定程度上補足了《中州集》的缺憾，當時被稱為「一代之作苞括無遺」。其實所收錄亦僅358人，詩554首。

但是，由於時代條件及編者主觀方面諸多因素的局限，郭元鈺《全金詩》也存在不少問題。一是從收錄範圍看，遺漏尚多。如《永樂大典》中保存的一些金人詩文別集，郭氏似未見；《歸潛志》足本為十四卷本，郭氏所採用者為八卷本；《道藏》中所保存的大量詩作，亦未予收錄。至于散見于其它有關書籍資料中的金人詩作，雖有收錄而遺逸甚多。二是從編輯體例看，也不盡合理。例如，郭氏在收錄詩作時，首錄《中州集》所收，次列補遺，即使有別集傳世者，亦如之。《中州集》未收，而有別集傳世者，則首錄《元詩選》所收，餘者再從別集補入。又如，《中州集》外所增補詩家詩作，除少數幾部專著外，均未注明採輯出處。再如，郭氏將詩家分為帝藻、公族、金源、諸相、狀元、宋耆舊、大家、名家、諸家、異人、隱德、河汾諸老、道釋、宴會、名媛仙鬼謠諺、遺獻等十六類，依此類聚排列，而不是以時代先後為序。這種體例造成了諸多混亂現象：同一詩人的作品被分置兩處，同一詩題的組詩被拆散，同一時期的作家不相關聯。這不僅不便于閱讀檢索，且又造成新的遺漏。

我們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對金代詩歌作更加全面的輯錄整理，按斷代總集的體例，編纂成此書。

本書致力于考訂詩人生平，撰寫小傳。元好問《中州集》小傳，內容豐富，不主一格，但是也存在着

或略或蕪，甚或舛錯之不足。本書則竭盡所能從現存文獻中擇取有關詩人生平行實的材料，尤其是從諸家文集所載墓碑、墓誌、行狀中，從傳世的金石碑刻中，從詩人自己的作品中，尋繹內證，訂誤補遺，撰述成文。如大定、明昌時的著名詩人王寂，《金史》未立傳，《中州集》亦述之頗略。其生卒年，各書均無明文記載。考王寂巡按遼東時的詩作，有一首透露出其生年信息：「踪跡年來遍朔南，消磨髀肉困征驂。居民勝日一百五，倦客流年六十三。水性依然人自我，樹圍如此我何堪。瓶無儲粟猶歸去，待有良田已是貧。」（《遼東行部志》）此詩作於明昌元年（一一九〇），知其生年爲天會六年（一一二八）。《中州集》謂其「壽六十七而終」，知其卒年則應在明昌五年（一一九四）。又如楊庭秀，《中州集》云：「庭秀字德懋，華州人。大定中進士。學詩於蘭泉張吉甫，有『渴心曉夢江湖闊，醉眼春風草木低』之句。泰和三年，刺澤州。致仕後，閑居鄉里。坐爲楊珪誣誤被法，士論冤之。」僅此六十三字。而楊庭秀任澤州刺史時，嘗有各種碑刻傳世。其《青蓮寺》詩刻題名云：「泰和丙寅上幹日華山晦叟楊庭秀茂才。」據此，知其字茂才，號晦叟。其《峽石山福嚴禪院記》碑云：「泰和壬戌冬暮，余由右司諫補河間之獻。乙丑夏五月，自獻移澤。」壬戌，泰和二年，乙丑，泰和五年。又有《崆峒巖壁題詩》云：「泰和五年十一月，連日雨雪，平地三尺。上幹日，游琵琶院。」既爲詩人自己撰寫，可以確知楊庭秀移澤州是在泰和五年，《中州集》有誤，當以石刻爲是。此外，在《金史》的《章宗紀》、《宣宗紀》、《韓玉傳》及《刑志》中亦見涉及楊庭秀的零星史料，鉤稽鑒別，使我們對楊庭秀的生平有了較清晰的了解。他在登進士第後，曾任右補闕、翰林修撰、右司諫，承安四年、五年，曾有諫言。泰和三年外補獻州刺史，泰和五年，移澤州刺史，以平涼府同知致仕。元好問所謂「坐爲楊珪誣誤被法」，係指大安三年，京師被圍時，楊庭秀與李公直等聚集州民起兵勤王之舉被錯誤鎮壓一事。我們撰寫小傳遵循的原則是，一方面，在盡可能交待清楚詩人生卒年代、籍

賈、科第、仕履的同時，亦將其師友交遊、著述成就、名家評語等適當寫入，力求提供較多的文獻信息，另一方面，不妄加一語，文獻不足時，則寧付闕如。因而對不少詩人的生平仍不得其詳。

本書亦注重校勘。傳世金詩，由于版本不同，或刊刻不精，文字上多有歧異及訛誤。本書收錄時對有專集傳世的詩作，在考定版本源流的基礎上，選擇善本、足本為底本，以有價值的參校本比勘對校。如李俊民《莊靖集》，初為元代段正卿刊行，明正德三年，李瀚復刻刊行。清乾隆時，上述兩種刻本已不可見，「今版已久佚，只存寫本而已。」（《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四庫全書》採用的是馬裕家藏本，即寫本。光緒十五年，李葆恂在開封書市發現明正德本，後為海豐吳重熹「假以付梓」，收入其所輯《石蓮盦彙刻九金人集》中。本書所收李俊民詩，即以海豐吳氏《石蓮盦彙刻九金人集》本為底本，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參校本。對於無專集傳世的詩篇，則考其出處，校其異同，擇善而從，一般以出處早者為據。本書破除前人以類相聚的編排體例，改以詩人生卒年代為序，重新編次。凡生年可考者，以生年為序；生年不可考而卒年可考者，以卒年為參照；生卒年不可考而登第年可考者，以登第年為參照；以上俱不可考，或參照其親屬、交遊、仕履、詩作刊刻等有開年代，據以編次。文獻所限，很多詩人的生卒年難以考確，因而只能盡量按生年先後或大約生年先後排列。生活年代一無可考者，另立專卷，編于書末。在各家詩作的編次上，凡有專集傳世者，一般不變動原篇目順序，另有輯佚，依次附後。無專集傳世，而《中州集》有收錄者，則首錄《中州集》所收，編次照舊，另有補遺，依次列後。

本書廣蒐博採，網羅散佚。自溢水、漳南、拙軒、遺山、莊靖、二妙、小亨數專集外，凡宋元諸家詩文別集、總集、史書、方志、道藏、類書、筆記、詩話、金石碑刻、書畫題跋，及文物考古資料中的金人詩作，雖殘篇佚句，無不甄錄。元好問編《中州集》時，已感慨兵火之餘金詩亡佚之甚：「計所存者，纔什一

耳」。他在小傳中所提到的專集（不包括時人），尚有七十餘種。清黃虞稷、盧文弨、金門詔等《補遼金元藝文志》金代集部書目亦有百十餘種，而今多已湮滅無存。要使有幸存世却散見於群籍的金詩咸聚一編，又要去偽存真，鑒裁必審，力求不誤收、不濫收。如《中州集》收在高士談名下的《楊花》詩，始見於北宋人石孝《橘林集》，南宋人劉克莊亦謂石氏作。元好問亦已發現此詩互見於兩人集中，但以高士談「文集是其子特夫手錄，恐無誤收」為據而收錄，其實，「當是士談愛而手錄，其子遂誤收。」（錢鍾書《談藝錄》）又如，《遺山集》卷一《雜詩四首》，亦見於宋人汪藻《浮溪集》卷二九，題作《咏古四首》。汪藻字彥章，北宋崇寧二年進士，為南宋初著名文臣。汪氏在世時已編就《浮溪集》，且廣為流傳，「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浮溪集》卷首孫觀序），可見是後人誤收入元集之中。凡經考證，確認偽作、誤收者，則予刪除，或作為附錄，略作辨正。在證據不足時，或依人重收，各於題下略作說明。

我們雖然盡力求全，實難稱全。限于識力和條件，本書中的遺漏和錯誤仍然會不少。我們誠懇希望海內外學者給予指評指正。

金源文獻有過自己燦爛的歷史，由於戰火和偏見而遭到嚴重損毀。有感於斯，我們兩位生活在金源故地的後學晚進，不揣鄙陋，發起志願，重新搜集整理，編纂包括《全金詩》在內的金源文獻叢書，舉於鄉，獻於國，希冀有裨於弘揚中華文化。

薛瑞兆 郭明志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二日於哈爾濱